

湖湘

周谷城 著

中国社会史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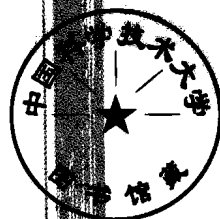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教育出版社

文库

周谷城 著

中国社会史论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教育出版社



湖湘文库
甲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史论/周谷城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9.11

(湖湘文库)

ISBN 978-7-5355-6342-2

I. 中… II. 周… III. 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1483号



湖湘文库(甲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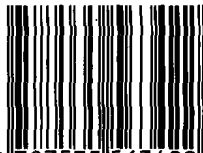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中国社会史论

著 者	周谷城
责任编辑	符本清 喻亚中
特约编辑	黄江文
责任校对	石 玢
装帧设计	郭天民
出版发行	湖南教育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网 址	http://www.hneph.com http://www.shoulai.cn
电子邮箱	228411705@qq.com
客服电话	0731-85486727 QQ 228411705
印 刷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640 1/16
印 张	55.5
字 数	600000
书 号	ISBN 978-7-5355-6342-2
定 价	111.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长沙市青园路4号 邮编:410004

ISBN 978-7-5355-6342-2



9 787535 563422 >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问	张春贤	周 强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彪
	肖 捷	许云昭	戚和平	谢康生	文选德
	孙载夫				
组 长	蒋建国	路建平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 员	李友志	钟万民	姜儒振	魏 委	吴志宪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周用金	朱有志
	王晓天	钟志华	刘湘溶	肖国安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魏 委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 员	唐成红	陈祥东	肖 荣	苏仁进
	田方斌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丁双平	朱汉民
				曾主陶
委 员	李建国	易言者	汪 华	刘清华
				黄楚芳
	黄一九	胡 坚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韩建中	谢冠军	杨 林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或据原本影印两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前言

邢战国

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阳人，现当代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周谷城出生于普通农家，其父去世早，其母虽是文盲，但性格倔强，很有主见；受其影响，周谷城也养成不轻易认输的倔强性格。周谷城7岁时开始在家乡的族立小学读书，农忙时干活，先后七年，接触到一些古典知识。

1913年，周谷城考入长沙省立一中。在省立一中，周谷城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特别是英语。周谷城在这里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尤其擅长作文。1917年，周谷城中学毕业，接着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英语部学习。此间，新文化运动趋于高涨，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的氛围空前浓厚。周谷城深受感染，思想极为活跃，还参加了“五四运动”。北京高师学习条件优越，周谷城又酷爱学习，他利用当时罢课多的“有利时机”广泛涉猎反映社会新思潮的各种书籍。受王桐龄、钱玄同、何炳松等大师们的影响，周谷城对历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自觉地把历史学作为自己的爱好和专业。

1921年春，周谷城提前半年离开北京高师，到湖南一师任

教。此间，周谷城结识了同在湖南一师工作的毛泽东，两人志趣相投，从此结下了深厚友谊。周谷城用“付款取货”的办法从日本函购了两套《资本论》（一套英文版，一套德文版），以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外语水平。1923年，周谷城编译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伦理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4年，周谷城在融会各家学说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生活系统》一书，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础，对其后的学术影响甚大。

大革命兴起后，周谷城深感空谈理论不行，认为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参与社会实践。1926年，周谷城前往大革命策源地广州了解情况。正在广州从事农运工作的毛泽东听说后专门找到他，邀请他参加农运工作，周谷城因湖南一师的工作未辞而婉拒。北伐军攻克长沙之后，周谷城在毛泽东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了湖南农民运动。1926年，周谷城运用剩余价值理论接连撰写文章，揭露农村的地租剥削问题。1927年春，北伐军占领武汉，周谷城也随之来到武汉，先后在邓演达主持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和毛泽东主持的全国农民协会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两湖地区的反动势力猖獗，周谷城远走上海避难。

初到上海，周谷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备尝艰辛，先后为中国公学、劳动大学和暨南大学附中等校代课，后又卖文为生。此间，周谷城先后撰写成《农村社会新论》、《中国教育小史》两书^①，并编译出版《文化之出路》、《战后世界政治之关键》、《苏

^① 《农村社会新论》，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9年版；《中国教育小史》，上海泰东书局1929年版。

联的新教育》、《苏联外交及其邻国》等进步著作^①。与此同时，他发表多篇有关中国历史和教育的文章。由于这些文章针砭时弊，得罪了当局，以至他后来的文章无处可发。1930年，周谷城在上海参与发起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该会旨在反抗国民党右派集团的反动统治。

1930年秋，周谷城应邀前往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和社会学系主任，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大学教授生涯。为了让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他开设采用英文授课的“社会科学名著选读”课，内容有《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进步著作。30年代初，周谷城的学术重点是社会学，相继撰写成《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和《中国社会之现状》三部社会学著作，也就是后来合编的《中国社会史论》。此间，他还翻译了美国人尼林著《社会学大纲》^②和《黑格尔逻辑学大纲》^③等著作。周谷城在中山大学的进步举动招致了学校当局的仇视，他们攻击周谷城宣传赤化，扬言要以子弹对付他。恰在此时，上海暨南大学邀他任教，周谷城顺势离开广州前往上海^④。

1932年秋，周谷城开始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兼史地系主任，主要讲授中国通史。他认为，教书就要著书。经多年努力，撰写成《中国通史》一书，1939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该书一出版就被当局认定有马克思主义嫌疑而遭到查禁，一些反动学者

① 《文化之出路》，上海新宇宙书店1928版；《战后世界政治之关键》，上海春潮书局1928年版；《苏联的新教育》和《苏联外交及其邻国》此两部书的著者为英国人，出版情况不详。

② 【美】尼林：《社会学大纲》，周谷城译，上海大东书局1933年版。

③ 【德】黑格尔：《黑格尔逻辑学大纲》，周谷城译，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

④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78页。

甚至咒骂周谷城是俄国人的孙子。学校当局也不再让他教中国史，而让他改教世界史。周谷城对此满不在乎，认为要研究好中国史，就不能不了解世界史，两者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深入^①。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沦陷。周谷城经杭州转移途中被日伪逮捕，关押了几十天，后经营救才得以脱身。1942年，周谷城经陈望道等人的介绍开始在复旦大学任教。他在新闻系开设有时事英语选读课，在文学院开设有西洋通史课，后来还在史地系开设西洋近古史课。除了教书之外，周谷城和同在重庆的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陶行知等知名人士过从甚密，一道从事民主运动。与此同时，他也很关注国际局势的发展，相继翻译《美国与战后新世界之关系》和《新英国与新世界之计划》两部著作^②。此外，他还发表不少政论性文章，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阐述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政治建设，并积极引导学生运动。

1946年春，复旦大学迁回上海江湾，周谷城担任历史系主任。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之后，他和张志让、潘震亚、沈体兰、翦伯赞等人发起成立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在报纸上发表反战宣言。1947年夏，因支持学生运动，周谷城被解除系主任职务。此后，他以主要精力撰写《世界通史》。1949年，《世界通史》的前三册撰写完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上海解放后，周谷城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委员兼复旦大学教务长。同年9月，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参与新中国的筹建活动。“院系调

^① 周谷城：《周谷城自传》，载《晋阳学刊》1980年第2期。

^② 《美国与战后新世界之关系》和《新英国与新世界之计划》均由独立出版社出版于1943年。

整”开始之后，周谷城以复旦大学教务长的身份做了不少工作，努力邀请外地学者到复旦工作。他还大力整顿校风校纪，使教学工作得以正常开展。周谷城为上海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也做了不少工作。1951年，他受郭沫若、翦伯赞等人的委托，成立中国新史学会上海分会（后改为上海市历史学会），长期担任会长一职。在周谷城等人的努力下，上海史学会发展成为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学术团体。1956年，周谷城参与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今上海社科联）的筹备工作，该会于1958年3月成立，他当选为副主席。

建国后，周谷城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讲授世界上古、中古史课程，但其研究领域广泛。50年代初期，周谷城发表文章阐发中国奴隶社会问题，在古史分期问题上提出“东汉封建说”。1956年，周谷城出版《古史零证》一书，显示出在古文字方面的深厚功力。五六十年代之交，周谷城接连发表文章，大张旗鼓地反对欧洲中心论。受苏联学术的影响，中国学界在建国初期出现了把形式逻辑辩证法化的不良倾向。周谷城虽然不是专业的逻辑学家，但他有深厚的逻辑学素养。1956年，周谷城在毛泽东“双百”方针的激励下挺身而出，撰文讨论形式逻辑和辩证法问题，着重阐述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周谷城的学术观点受到批判和围攻，但他不愿屈服，仍接连撰文辩论。

六十年代初期，周谷城发表《史学与美学》等文章^①，其中的“无差别境界”和“时代精神汇合”论再次引发全国性的学术大批判。周谷城孤军奋战，坚持辩论，直至“文革”到来，作为

^① 《史学与美学》，原载1961年3月16日《光明日报》；《礼乐新解》，原载《文汇报》1962年2月9日；《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原载《新建设》1962年第12期。

上海第一批“反动学术权威”而被彻底打倒。周谷城在“文革”中饱受人格侮辱和肉体摧残，但他没有屈服，也没有消沉^①。

“文革”结束后，周谷城重获解放，心情畅快，虽年事已高，但壮心不已^②。他一面参加繁忙的社会活动，一面坚持教学科研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等多项职务，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建言献策^③。除了繁忙的社会活动之外，周谷城还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教学、科研之中，仍在复旦大学登台授课，培养出我国“文革”后的第一批硕士和博士。晚年的周谷城积极倡导文化建设和文化史研究，力主加强中西文化交流，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1996年11月20日，周谷城在上海病逝，享年99岁。

《中国社会史论》是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学术著作，在周谷城本人的学术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为其后来撰写《中国通史》打下基础。《中国社会史论》在中国近现代学术体系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史论》着重探讨社会要素间的矛盾运动及其导致的社会变化，重视结构要素的互动关系，因而颇

① 业师姜义华先生多次谈及周谷城在“文革”时期遭受迫害的情况。另可参阅葛剑雄整理《谭其骧日记选（1966年5月至1970年12月）》，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1期。

② 他在座谈会上指出：“今天我们是忆苦思甜，忆过去受‘四人帮’迫害之苦，思今日之甜，知识分子第二次解放是甜，臭老九不臭了是甜；民主党派摘掉资产阶级政党的帽子，是革命的、进步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是甜；知识分子原是专政对象，现在成为依靠对象，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是甜；有学术民主是甜，……”复旦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校统战部档80—11号，1979年2月9日，第45页（未刊）。

③ 姜义华主编：《史魂：上海十大史学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

能说明问题，是我国早期社会结构史研究的代表作^①。其鲜明的特点是：

学术求真与致用的统一。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重大现实问题摆在人们面前，思想界就此问题的激烈讨论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作为大革命参与者的周谷城对此问题自然也很关注，这也正是他撰写《中国社会史论》的动机之所在。有学者指出：“周谷城撰写《中国社会史论》之目的，完全在于揭示中国社会转变的原因，以图改造中国社会的现状。”^②《中国社会史论》的致用精神在《中国社会之现状》的《弁言》中有明确的表述：“研究现代问题较翻线装书重要数十倍；故近来只想把注意力之焦点转移到现代最迫切之问题上。”^③此话显然是针对不顾时事而只管埋首故纸堆的学风而言的。中国社会有没有阶级性？此问题事关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命运，思想界对此争论激烈。《中国社会史论》明确肯定中国社会的阶级性，《中国社会之结构》在《弁言》中有针对性地写道：“我写这本小书，目的只是要把中国社会之阶级的结构，或不平等的结构暴露出来。中国社会里的不平等、有阶级是很显著的事。”^④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有何影响？中国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此类问题也是事关中国社会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中国社会之变化》在《弁言》中明确指出：“书中主要之点，只在说明帝国主义如何影响中国社会全体；换言之，只在说明中国社会全体怎样套在世界经济网里面去的。”^⑤《中国社会史论》还明确指出研究中国问题的立场问题，

① 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② 莫志斌：《周谷城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

③ 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现状》，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年版，“弁言”。

④ 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结构》，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版，“弁言”。

⑤ 周谷城：《中国社会之变化》，上海新生命书局1931年版，“弁言”。

强调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必须站稳自己的立场，也就是立足于了解中国、改造中国并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摆脱出来而研究中国。此外，《中国社会史论》对空谈理论的学术风气提出批评：“研究中国问题时，其所发表的著作，好像专作论文，与中国问题好像不相干。”^① 总之，《中国社会史论》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历史紧要关头着力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主义之作，是学术求真与致用的有机结合之作。回顾其人生经历，我们不妨说，周谷城的一生也正是学术求真与致用的一生。早在《生活系统》一书，周谷城就强调求真与致用的问题^②。在此精神的指引下，周谷城既广泛从事学术研究又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终成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早在北京高师期间，周谷城即倾向于马克思主义^③。湖南一师期间，周谷城的马克思主义又有发展^④。大革命兴起后，周谷城一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撰写文章，一面投身农民运动，特别是协助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这表明，周谷城不仅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者，而且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者。大革命失败后，周谷城虽游离革命队伍，但其革命志向未变，《中国社会史论》正是他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来阐明中国社会的学术著作。《中国社会史论》不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而且明确宣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资产阶级学说的不足为训。值得称道的是，《中国社会史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明中国社会时并没有忽略中

① 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现状》，上海新生命书局 1933 年版，“导论”。

② 《生活系统》第六章“科学在生活之上之位置”，有专文分析学术求真及其致用问题。

③ 吕涛、周骏羽：《周谷城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7～22 页。

④ 周谷城在此期间研读《资本论》，同时与毛泽东交往密切。

国实际，而是力求两者的有机结合。为阐明中国实际，《中国社会史论》广泛运用各种数据和材料，并且对只见理论不见材料的空疏学风提出批评^①。为阐明中国实际，《中国社会史论》没有囿于狭隘的党派之见，而是广泛借鉴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理论成果，特别是借鉴邓演达和陶希圣等人的观点^②。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史论》力求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概念出发。例如，《中国社会史论》以封建制（本义）的兴衰为依据来划分中国历史：自远古至黄帝为无政治时代；自黄帝至周初为贵族政治时代；自周初至秦为封建政治时代；秦代为封建政治和专制政治的交替时代；秦代以后为专制政治时代。此种划分因切合中国实际而为学界所称道^③。再如，《中国社会史论》没有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忽视阶级斗争之外的民族斗争和生存斗争，也没有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刻意拔高或贬低事实。也正因为此，《中国社会史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时能够切中要害，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④。值得一提的是，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中国社会史论》的这一学术特点即为美国学者史华慈所关注^⑤。此后更有学者明确指出，周谷城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注重历史证据并在此基础上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⑥。

实事求是之论。《中国社会史论》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

① 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现状》，上海新生命书局 1933 年版，“导论”第 4 页。

② 周谷城和邓演达同是“第三党”的发起人。周谷城与陶希圣关系密切，受其影响甚大，《中国社会之结构·弁言》指出：“书中第一章第二节头一项政治制度，我因同陶希圣先生谈话，受了他的暗示，自己的见解变了，很想再写过或修改一下。”

③ 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92 页。

④ 莫志斌：《周谷城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4 页。

⑤ Benjamin Schwartz: A Marxist Controversy on China,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3, No. (Feb., 1954), 143—153.

⑥ 【美】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6 页。

的相结合，其平实之论俯拾皆是，兹举例以说明之。近代以来，由进化论演绎而来的生存斗争说能够风靡世界，个中原因绝非偶然。因为生存斗争是人类乃至任何生命有机体基于生存之上的斗争，因而也必然是最为基本的斗争形式之一。我们甚至不妨说，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也是基于生存斗争之上或与之有关的斗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和客观存在，生存斗争不会因阶级斗争理论的提出而消失。《中国社会史论》重视阶级斗争理论，但显然也没有忽视生存斗争的客观存在。例如，《中国社会史论》在分析远古时期民族斗争的起因时指出，“各民族为着要图生存，为着要占领最优的生活环境，为着要防止他人的侵袭”而争斗。又如，民国时期都市社会犯罪高发，《中国社会史论》明确指出其原因为贫富悬殊和生存竞争的激烈^①。《中国社会史论》虽力倡反帝运动，但也明确肯定帝国主义的某些客观作用：帝国主义的侵略逼出中国的产业革命，而产业革命促使中国发生根本变化，变化的方向为资本主义化等。周谷城虽深切同情民众的不幸遭遇并且在大革命时期还直接从事农民运动，但他没有因此而回避民众的某些落后性，也没有刻意拔高其革命性。例如，《中国社会史论》明确指出历史上的农民暴动多凭借迷信口号作宣传、带有浓厚的皇权意识，以及暴动的有乱无变等。周谷城认为，新式企业中存在明显的劳资两立，而旧式企业就不然，“在旧式工业之下，店主一方面虽为主人，同时在另一方面也是劳动者，很少有站在实际工作以外的纯粹资本家。”义和团的自发爱国运动以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招致八国联军的野蛮镇压，帝国主义列强还逼迫清政府签订空前丧权辱

^① 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结构》，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版，第11页；第176页。

国的“辛丑条约”。《中国社会史论》对此据实写到：“大压迫固然可以引出大反抗，但大反抗也必然引出大压迫。”^①断章取义地看，此话似乎甚为反动。但考虑到义和团的愚昧落后特别是盲目排外以及清政府的极端腐朽和昧于世界大势，此话又甚为平实。此外，周谷城认为张之洞、梁启超和胡适等人在新旧思想嬗变进程中具有代表性地位的观点也是实事求是的和精辟的。等等。令人叹息的是，《中国社会史论》的平实之论在极左时期竟成为弥天大过，被批判为反动的生存竞争观、外铄论、投降主义道路、阶级调和论、仇视农民战争以及为反动人物翻案等。然而究其实质看，此等批判不过是指责《中国社会史论》不讲阶级斗争或讲得太少而已。

不足与局限。《中国社会史论》原为三部独立之作，合编后也只是略加修订，基本内容未变，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上、中、下三篇重复内容较多，这就势必影响全著的整体性。不过，《中国社会史论》的主要问题还是阶级斗争问题，不是讲得不够，而是讲得太多^②。“一部斗争的中国史”似已表明《中国社会史论》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偏爱，而“最透辟的学说”更表明《中国社会史论》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折服。我们认为，阶级斗争理论虽不失为分析阶级社会的得力工具，但显然也有其适用性，偏重阶级斗争理论也就难免有偏颇之论。阶级斗争理论要求明确划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大对立阵营，但实际情形往往很难做到。如勉强为之，则势必脱离实际。《中国社会史论》对此问题也是左右为难。例

① 周谷城：《中国社会之变化》，上海新生命书局 1931 年版，第 71 页；第 29 页。

② 周谷城后来坦承《中国社会史论》阶级斗争讲得太多而辩证性不足。参阅上海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周谷城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27 页。